



历史印记



九州出版社
钱婉约 著
《内藤湖南的中国学》

□严绍璁

我国20世纪史学界中的老辈学者者大都知道内藤湖南这个名字,而当前治史学而留意于国外学术成果者也愈来愈留意于这位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人。但是,由于内藤湖南的史学体系庞大而复杂,我国人文学界至今真正知其事而论其学术者,或知其学术而论其人者,则仅有寥寥数位,其所言者也大都断片心得。钱婉约著作《内藤湖南的中国学》,作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内藤湖南的专门性著作,多少体现了我国人文学者对于“日本中国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了较为体系化的深入的采掘。

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谱系考察,内藤湖南是属于20世纪初期日本“中国学”创始者行列的学者。日本的“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泛亚洲史”。内藤在中国历史、中国文献学、甲骨金石学诸领域中,都极为活跃,并有相当的业绩与成果,由此而构成的“内藤史学”成为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传统的“汉学”走向近代“中国学”

内藤湖南：“非学院派”的汉学家

的桥梁。当然,在内藤时代,在所谓“万国文化”(即世界文化)研究理念的刺激下,引领学术界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日本近世以及近世之前的“汉学”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而重新组合成为“近代中国学”学术的,并不只是内藤湖南一人。这一学术转变过程大约历经了三十年左右,它是先后由至少两代新进学者掀起的一场“学术狂飙运动”而共同推进实现的。内藤湖南作为这一新学术中以“东洋史”研究为中心的学者,成为“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本书作者正是立足于对近代日本“中国学”发生的总体学术态势的深刻认识和对于这一学术谱系的全面的把握,展现了“内藤史学”丰厚多彩的内容。

本书特别注意到内藤湖南不是一个“学院派”学者。这位蜚声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学术巨擘,这位在世界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中国史讲座”整整二十年的教授,却只有中等师范的学历。他于1885年在日本海沿岸的秋田师范毕业之后,就步入社会。他所有的学业知识,没有确认的“导师”背景,完全是他个人的求知激情与坚韧的学术自学相糅合奋斗的成果。

内藤湖南在成为学者教授之前,先是在大学围墙外的操觚界(即新闻界),继而在政治界舞文弄墨,而此种营生,却也正是日本人文学界“学院派”学者所不为而特别被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们所不齿的,此种“学院心理意识”一直延续至今。通观当今的日本“中国学界”,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

育的人,一个远离学术圈的人,几乎是不可能成为学界所承认的“中国学者”的。读者通过对内藤湖南个人生存经历和思考,可以体验到日本“中国学”形成时期所内含的“各路英雄聚会”的生命力,甚至可以扩展到对一般人文学科内在潜力的想象和判断。本书对于内藤湖南一生与中国至为密切的关联以及此种关联与学术的连接作了精细的解读。

日本传统的“汉学家”几乎都是闭门读书,自省体悟,偶有心得,辄记成篇。内藤与此很不相同,他经常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亲眼见到甲骨文并向国外报道的外国人,我推测他也是最早见到中国敦煌文献的两三个日本人之一。他在中国的人文氛围以及与中国诸多的人事交涉中感受中国和中国文化,并以此而形成了成就他学术的“文化语境”。其中,他与罗振玉、王国维诸人的“至交”,成为他在学术上激发自身创新意识的重要因素。

内藤湖南的此种思绪心路,多少体现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们正致力于把传统做学问的“文献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推向了“文化语境实证”的观念和方法论,这是日本“中国学”作为一种学术而具备“近代性”价值的体现。或许对于内藤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在总体社会意识和学术大趋势中所表现的“无意识”的行为,但就其对学术史的考察来说,正是这些“无意识”和或许“有意识”的学术痕迹,成为他们造就一门新学术的轨迹,成为留给后世学人的遗产。

看了就评

《坏小孩》“坏”在哪里



湖南文艺出版社
紫金陈 著
《坏小孩》

□王昱

在追完热播网剧《隐秘的角落》后,又抽时间看了原著小说《坏小孩》,忍不住向追过《隐秘的角落》的朋友推荐一下这本小说。

并非因为原著《坏小孩》有多好,正如很多评论所言,如果没有改编网剧的加持,《坏小孩》仅仅只能算一部中规中矩的通俗小说,其风格甚至是偏阴暗、偏致郁的。但跟网剧对比之后,你会发现通俗和经典之间真正的差距在哪里:为什么大致相似的故事架构和人物原型,《坏小孩》只是一部普通的通俗小说,而《隐秘的角落》却会成为一部难得的经典好剧?

《坏小孩》的问题并不在其作者紫金陈备受诟病的文笔上。也许是为了刻意模仿小孩子的语气,紫金陈的文笔让这部小说读起来很像“故事会”,还有很多“眼泪如兰州拉面般滚了出来”“手像印度飞饼一样拦住”的奇葩比喻。这样粗拙通俗的文笔也许恰恰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文笔的朴素有时反而会节省读者的精力,让他们能够更快节奏地阅读。正如紫金陈自己坦言的:“我写的就是快节奏小说,你可以理解为快餐文学,我只希望好看。”

忽略了小说的文笔之俗,《坏小孩》的故事讲得确实是非常好看的,而其故事之所以好看,是因为作者非常成功借鉴和模仿了日本畅销小说家东野圭吾的故事架构。

通观《坏小孩》的故事结构,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建立在对东野圭吾两部最著名小说的模仿之上的:故事的前半段,我们隐约看到了《白夜行》的影子,朱朝阳与普普这对彼此暗生情愫的青春期男女主,在一个成年人犯罪事件的推动下,结成了奇特的共生关系,一明一暗通过接连犯罪,铺就了自己的成长之路;故事的后半段,俨然小说《恶意》的翻版,男主朱朝阳通过日记的形式完成了对事件的重构和对警方的误导,差点让自己成功脱罪。

可以说,这种模仿是非常成功的,由于作者更加重点的刻画,“青春期黑暗”这个主题得到了更加鲜明突出,所以有人将《坏小孩》称作“中国的《白夜行》”,将紫金陈称作“中国的东野圭吾”,我觉得这并非过誉。

但《坏小孩》的问题,也出在对东野圭吾过于成功的模仿上。

在日本,东野圭吾之所以一直只是最成功的畅销小说作家,而无法成为另一个村上春树或者川端康成,原因就在于他的小说虽然故事讲得好看,但人物几乎都没有人格张力,也没有成长。

除了《解忧杂货铺》等少数几部带奇幻色彩的小说,他的大多数“社会派推理”小说,主人公都在事件的导火索点燃之后立刻投向了人性黑暗面的怀抱,“一次都没有回头”——《嫌疑人X的献身》中,石神在女主犯罪后立刻构思了杀流浪汉帮其脱罪的完美计划;《白夜行》中男主替女主犯罪也没有过犹疑和抉择;《恶意》中的野野口修对挚友的恶意更是不讲道理也没有缘由的。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世界里,所有主人公作恶时都没有什么道德障碍,他们一出场就是潜在的犯罪者。就仿佛《坏小孩》开篇中的那对岳父岳母,是坐在恶之深渊边上的灵魂,只等着张东升轻轻一推,就会干净利落地掉下去。

《坏小孩》几乎完全继承了东野圭吾的这套善恶观。“全员恶人”是很多人在看完小说之后的第一印象,主人公朱朝阳一登场就如书名是个“坏小孩”,对陷害他的同学充满恶意,称呼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婊子”和“小婊子”。恶之种在小说开篇就已经在他心头埋下,小说仅仅是一个他萌出恶之芽,开出恶之花,结出恶之果的故事。

这样的小说当然读起来很“顺滑”,但它却是失真的,因为真实的世界固然不像童话中那般“全员善人”,但也很少有人真的永远在恶之深渊中徘徊。在善恶之间不停地徘徊、犹疑,构成了人性当中最矛盾也最具戏剧性的一面,一流的文学、艺术作品一般都不会错过描述这种“人性的张力”,雨果的《悲惨世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之所以感人,都得益于此。

幸而,《隐秘的角落》在改编时对《坏小孩》的这种善恶观做了极大的修改。在剧版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物都变得有血有肉、有成长、有抉择:主人公朱朝阳的善恶徘徊一直延续至剧终,最终还被呼唤“不要成为下一个张东升”;其父亲朱永平也从原先刻板化的不负责任的坏爸爸,变为在两个家庭、父亲责任之间摇摆抉择;善良(原小说中的丁浩)的成长轨迹,因为老陈这个纯正面角色的加入,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甚至连张东升这个原小说中的“恶之源”,剧版也专门辟出一集“张叔叔”来展现他的道德抉择,这个人物也因此变得生动立体起来。

只有首先承认人性的可善可恶,再去讨论剧中人物为何会堕入恶之深渊之中,才会显得有价值,才会触动观者的灵魂。若非如此,对恶的描写就会陷入一种单纯的猎奇当中,以描写更加骇人听闻的恶为乐。日本文学批评界一直存在一种呼声,认为东野圭吾的小说越发沉迷于“恶的炫技”,其实东野陷入的正是这样一种写作怪圈。

作者自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原老末 著
《罩袍之刺：女性视角下的阿富汗》

□原老末

从2013年9月开始,阿富汗不知不觉已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近几年人生中比较大的事,我都是以“第一次去阿富汗前”“最后一次去阿富汗后”的方式记在脑子里的,去历年份反而成了第二顺位,在需要更精准的时间表达时才会拿出来用。

“那里是不是特危险?”别人总爱这么问。我通常的回答是:“有危险,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危险。”作为一些人炫耀经历的地方,这是一个来了就百分之百“被塔利班用枪指着头”的国家,说得好像塔利班人都很闲,没事就会等在外国人常去购买旅游纪念品的“鸡场街”或新城区的公园附近,见到外国人就跑去用枪指着头,心中数秒几十下再迅速跑开,消失在人海中一样。这种不负责任的夸大把新华社喀布尔分社的人都气得够呛:“简直没有底线。我们在这里常驻几年都没有碰上更没有听说过的事,怎么刚好全让他们碰上了?”

而相对于和平国家,阿富汗无

罩袍之刺

自2013年以来,独立摄影师原老末三次深入阿富汗,以平视的角度,用所见所闻来真实呈现当代阿富汗女性的生活。作者深感人们的偏见就像一根刺牢牢地钉在罩袍上面,罩袍遮挡的不仅是她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双眼。

疑是危险的,对于当地人,尤其当地的新闻工作者和少数派什叶派穆斯林更甚,比如我的朋友拉赫马特。我上一次离开阿富汗不久,即公历2018年5月9日,拉赫马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配图是他的女儿阿米塔,惊恐的脸上全是泪水:

“人体炸弹刚刚袭击了我家所在的13区。现在袭击还在继续着。这是我年满一周岁的儿子阿米塔。她第一次听到爆炸声,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被吓坏了,大声地哭个不停。我的女儿,爸爸对不起你,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地方。”

拉赫马特打下的一个个字母列队整齐,像一柄柄短剑瞄准着我的心挨个发射,一行行地读下去让人鼻子发酸,心里难过极了。

每次从阿富汗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回到正常的生活是一种背叛。北京有不间断的电力,有电动门,有电梯。这儿的饭馆可以男女混坐,门口也没有荷枪实弹的保安。一天又一天,随着自我调整,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淡,对生命的敬畏似乎逐渐变得没有在阿富汗时那么触动人心,活着偶尔也成了一种虚度,而不再是对平静生活的感激。

罩袍,英国人称为波卡,阿富汗人叫它茶达里,这种长至脚踝,面部用网眼布料织成的蒙面长袍,是外界对阿富汗女性的刻板印象之一,虽然它是一种典型服饰,也并非所有女人都会穿它。

种种刻板印象就如一根根刺,

牢牢地扎在罩袍上面。这布料有时遮挡的不仅是她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双眼。

还好,对于别人描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话,我通常不会全信。毕竟说出口的、记录在纸上的都已经是一种观点,无论阐述的人声称他有多中立,因为中立毕竟也是相对的。角度决定态度。即便是报道事实,新闻也可以用字体的大小、词语上加的引号、图片的剪裁来表现该媒体的观点,而读者也在阅读的同时被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热扎伊,生于伊朗的阿富汗难民,她12岁的生日愿望是回到自己的祖国;

吉尔赞姆,阿富汗游牧民族库奇人的后代,她的女儿们开办了山区里的广播电台,在男权社会中用温和巧妙的方式为女性发声;

瑞吉娜,曾被评为改变世界的100名女性之一,她在坎大哈,这个位于阿富汗南部保守地区,女性就业率全国排名垫底的地方,创办了当地第一家95%的员工都是女性的纺织刺绣公司,把“卡玛克”这种在战争中几近失传的民族工艺保存了下来。

……

书中的六个女人,从教中国武术的老师到年近半百依然做饼的妇人,从前任坎大哈市市长的女儿到普通普通的女大学生,她们出生在不同的省份,来自不同的民族,从事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性格,阿富汗女人和我们一样,没有更高尚,也没有更卑微。